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歷史修正主義與新民族主義：日本修改教科書爭議的政治效應

Historical Revisionism and Neo-nationalism: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extbook Controversies in Japan

doi:10.30390/ISC.200602_45(1).0004

問題與研究, 45(1), 2006

Issues & Studies, 45(1), 2006

作者/Author：羅志平(Chih-Ping Lo)

頁數/Page：81-10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6/0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602_45\(1\).0004](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602_45(1).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歷史修正主義與新民族主義： 日本修改教科書爭議的政治效應

羅 志 平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 要

歷史修正主義是後現代的文化現象，原本是學術研究的一種方法或觀點，但在二十世紀末以後卻被刻意誤用，尤其是民族主義者變本加厲的操弄，結果不但模糊了歷史的真相，也使國際關係變得更複雜。本文先以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所引起的爭議為例，闡釋歷史修正主義一詞的意義、起源，以及當今人們的誤用，然後再以「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等歷史遺留的問題為例，分析歷史修正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合流，藉此解釋困擾中日關係的因素。國際關係固然複雜，但是若能摒棄民族主義的偏見，歷史的「事實」還是可以重建，不會只是一種「觀點」。

關鍵詞：歷史修正主義、教科書、南京大屠殺、慰安婦

* * *

壹、前 言

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 (Bill Clinton) 的自傳我的生活 (My Life) 剛上市便成為暢銷書，就在熱賣之時，書中的女主角莫妮卡·呂溫斯基 (Monica Lewinsky) 卻接受英國每日郵報 (*The Daily Mail*) 和獨立電視公司的採訪，說：「柯林頓是個歷史修正主義者，他說謊」。^①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 在善惡總統一書中評述布希 (George W. Bush) 總統的政策和人格，對布希出兵伊拉克很不以為然，認為布希是

註① 呂溫斯基認為柯林頓沒有誠實地交待他與自己的關係，而且為了保護自己的總統職位，刻意將所有責任推給她，把她形塑成像是自助餐上任人取用的糕點。參見 *USA Today*, June 25, 2004, <http://www.usatoday.com/life/books/news/2004-06-25-lewinsky-clinton_x.htm>

個「歷史修正主義者」。^②布希面對來自各方面的指控與責難，也反咬一口說他的批評者是「歷史修正主義者」。近年來大陸的學者經常以「歷史修正主義」一詞批判日本的歷史教科書編撰，「歷史修正主義」一詞變成現代生活的流行術語，影響層面愈來愈廣，舉凡文學創作、電影拍攝、政治競合、宗教釋義、乃至外交關係都受到這種思維的影響。但是，對於何謂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的起因、乃至於它的政治效應，學界仍然缺乏嚴謹的討論。

被尊稱為歷史修正主義泰斗的羅伯特·福里松（Robert Faurisson）說：「歷史修正主義是二十世紀末人類最大的思想冒險」。^③儘管福里松是個爭議性很大的學者，但是他這句話卻一針見血地說出了當前思想界的混亂狀態。任何的「冒險」都有危險，歷史修正主義最大的危險在於它破壞了社會既存的價值觀，顛覆人們對歷史事件的記憶，助長「爆料」新聞的蔓延。一部被視為「異端」的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竟然以四十四種語言，發行了四千多萬份，^④除了聖經外，再也找不出別的書有這樣的魅力。現代人似乎愈來愈不能滿足於「陳腔濫調」的歷史敘事，求新求變成了後現代文化精神的一種體現；如果只從這個層面去思考，可能會低估歷史修正主義的影響力。這種意識型態如今正影響國際關係的重新組合，中俄聯合軍演、美日安保條約、國（民黨）共（產黨）和談，政治沒有不可能的事，但總得有個理由。歷史修正主義隨時準備提供可用的「觀點」，好讓充滿矛盾的行為有個合理的解釋，即使是「似是而非」，還是有信眾接受。尤其是當歷史修正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歷史「事實」便淪落成僕人，任由主人宰制。

自古以來，戰爭是解決問題的最終手段，同樣也是紛爭的開始。兩國交戰之時，水火不容；一旦戰事結束，握手言和，盡釋前嫌，這種荒謬的戲碼一直在上演。有些戰爭是為爭奪實質的利益，有些則是意識型態上的不相容，不論是宿敵或世仇，都有和解修好的可能，就看各自的領導人和人民如何看待過去的歷史。曾於越戰期間派駐西貢的時代雜誌記者巴瑞·希倫伯蘭德（Barry Hillenbrand）在越戰結束三十年後重返越南，看到越南繁榮的景象，感慨地寫了一篇「評論」：「越南人往未來看，他們甚至化解了和美國人之間的歧見，如今他們眼中的美國人是慈祥和藹的觀光客，或者就是顧客，……打贏了戰爭，生意也穩定成長，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表現出度量」。^⑤希倫伯蘭德不能理解的是為何中日戰爭已經過了六十年，中日兩國仍然還在為各自的戰爭版本爭論不休？

這個問題確實不易回答，中日兩國之間關於修改歷史教科書的爭議，基本上是要找出一種「觀點」，一種符合民族主義意識型態正當性的「觀點」，用它來詮釋過去

註② Peter Singer, *The Present of Good and Evil: The Ethics of George W. Bush* (New York: Dutton, 2004).

註③ Robert Faurisson,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s the Great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Dissecting the Holocaust*, Theses & Dissertation Press, 2000.

註④ Michele Orecklin, "Dan Brown: The Novel That Ate the World," *Time*, Special Issue (April 18, 2005), p. 88.

註⑤ Barry Hillenbrand, "Good Morning, Vietnam," *Time*, Vol. 165, No. 17 (May 2, 2005), p. 56.

的歷史和現在的作為。影響國際關係的層面很多，但歷史往往是主要的糾葛，誠如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說，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歷史學家在政治上反而變得更重要。民族國家的分解、集體認同的興起與冷戰的結束加重了歷史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為了建立新的國家認同（或支配整個國家），而去「發明」一個屬於自己的歷史，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無可厚非。^⑥面對這種歷史修正主義的浪潮，霍布斯邦進一步說，歷史與政治的關聯提醒我們，別的民族有政治迷思，我們何獨不然！

基於以上的認知，本文嘗試從幾個層面來解釋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修改的動機，並分析幾個重大歷史事件之所以引發國際紛爭的表面與實質原因。基本上，筆者認為這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問題，民族主義者在意的不是歷史的真相，而是歷史「敘事」的效用。也就是說教科書的爭議關係到「政治正確」的選擇，不在乎是否「歷史正確」，如果二者出現矛盾，便利用「歷史修正主義」加以潤飾。本文首先分析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歷史修正主義」如何產生、演變、以及現今人們對它的理解。其次分析日本右翼團體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目的、教科書爭議的重點以及新民族主義的內涵。最後再以教科書爭議中的兩件大事——「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分析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如何將這些事件化約成圖騰，以及女性主義者在慰安婦議題上的努力。筆者認為，「歷史修正主義」是手段，「民族主義」也是手段，國家的利益才是最終的目的。但是，也不能為國家的利益，讓「神話學」取代歷史知識，如果歷史只是一種「觀點」，那麼，宗教、道德與司法也會變成只是一種「觀點」。

貳、歷史修正主義的興起與演變

歷史修正主義者（historical revisionist）這個名詞是由兩個英文字所組成：「歷史」（history），指對過去事件的研究，希臘文字根為 *historia*，意為「敘述」（*narrative*）。另一個字是「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修正」（revision）意指檢視與更新的動作，源自拉丁字“*revisere*”，意為再看一次，加上字尾“*ist*”，用以表示某種信仰的支持者。名詞字尾“*ism*”源於希臘文字根-*isttes*。「修正主義者」這個字流行於二十世紀上半期，大致上有二層意義。

首先，「修正主義」指的是共產運動中一種週期性的趨向，用以對馬克斯的理論加以不時的修正，不論其立場是革命或改革，馬克斯理論永遠正確無誤。^⑦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修正主義」便被用以描述像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考茨基

註⑥ Matthew Continetti, “Hobsbawm Speaks on Historical Revisionism,” *The Columbia Spectator*, April 1, 2003, <http://www.columbiaspectator.com/vnews/display.v?TARGET=printable&article_id=3e89597c70a03>

註⑦ See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urth Editi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4, <<http://www.answers.com/library/Dictionary-cid-681495949>>



(Karl Kautsky) 這群想要修正馬克斯 (Karl Marx) 教義的作家，他們認為光靠激進的革命不足以實現社會主義。到了二十世紀 40 年代和 50 年代，在國際共黨運動中「修正主義」則用以指稱那些主張以消費商品生產取代重工業、承認民族差異性並鼓勵民主改革的共產主義者。從 1949 年開始，東歐一些接受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和狄托主義者 (Titoist)，便經常以「修正主義」作為清算鬥爭的藉口。史達林死後，「修正主義」曾短暫地被納吉 (Imre Nagy) 的匈牙利政府和哥穆卡 (Wladyslaw Gomulka) 的波蘭政府所接受，儘管如此，這兩個人卻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修正主義者。1956 年匈牙利發生革命，蘇聯出兵鎮壓，許多匈牙利人尤其是知識份子，紛紛脫離共產黨以示抗議，他們經常被「保皇派」(loyalist) 的共產黨員指控為修正主義者。湯普森 (E. P. Thompson) 的「新理性者」(New Reasoner) 便是此種修正主義之一例，這種運動最後演變成今日大家所熟知的「新左派」(New Left)。60 年代初，由於意識型態和政治議題上的歧見，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重新界定「修正主義」的意義，用它來抨擊赫魯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和蘇維埃政權，這是中蘇決裂的部份原因。在整個 60 年代，中國習慣稱蘇聯為「現代的修正主義者」(modern revisionists)。^⑧

社會主義中的修正主義，不是本文關心的重點，本文所欲探討的是「修正主義」的第二種用法，俗稱「歷史修正主義」或歷史的「修正主義」，倡議對一些公認為真實的（通常有悠久歷史）的觀點、理論或教義加以修正，尤其是歷史上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或運動。對歷史學家而言，修正主義只是一種歷史的研究或寫作方法，亦即使用新發現的史實，以更精確且不帶情感偏向的資訊，重新檢視大家已熟悉的「事實」，或重新詮釋歷史的一種態度。廣義的說，這是一種懷疑論的方法，也是歷史寫作的真精神，所有的歷史寫作，某種程度上都是「修正主義的」。如同芝加哥大學史家斐迪南·謝維爾 (Ferdinand Schevill) 所說：「著名的史家都是修正主義者」。^⑨的確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著名史家如查爾斯·比爾得 (Charles A. Beard) 和由社會學家變成史學家的哈利·巴尼斯 (Harry Elmer Barnes)，都曾寫過批判美國外交政策的書，其修正主義的立論不但影響了那個時代的輿論氣候，更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白皮書的參考指南。

「歷史修正主義」在政治上的應用開始於德國。1919 年時，為了抗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強迫德國接受的懲罰性條約，德國努力要修正其條款，改變當時重劃的歐洲疆界，這種動力促使歷史修正主義的興起，最終也造成希特勒 (Adolf Hitler) 掌權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不過，這種歷史修正主義的目的不是針對地理上的不公平，而是將注意力指向「記錄」(record) 的不公義，也就是說抗議將德國視為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正如凡爾賽條約中的記載。任何德國人都不願受此污名，

註⑧ From Wikipedia, "Revisionism," <<http://www.answers.com/topic/revisionism>>

註⑨ 轉引自 John Lukacs, "Revis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Heritage*, Vol. 45, Issue 5 (Sep. 1994), pp. 83~88, <<http://web36.epnet.com/>>

必會挺身而出。早在德國民主共和政府剛成立之時，便已有人著手出版一些文獻，力圖證明使 1914 年的戰爭得以到來的罪人不只德國一個。在後來數年間，又陸續出現了一系列更具學術性的文件匯編。德國人強烈地感受到「修正」的必要性，以致在 1923 年時一位德國的業餘史家維格爾（Alfred von Wegerer）開始發行一份名為戰罪問題（*Die Kriegsschuldfrage*）的學術性期刊。

當許多德國人開始修正對二十世紀的看法之時，一些同情納粹行事的人也開始出版一些通俗歷史，提出與主流思想不同的解釋。這一群人通常是自學的史家、年輕的學者、少數族群的史家、女性主義者或被學院主流所排斥的大學教授。首先，他們先將大屠殺的規模予以輕描淡寫，弱化納粹所犯的罪行，並強調「軸心國」（Axis）人民在「同盟國」（Allies）的威逼下所受的苦難，暗指發動戰爭的罪惡，同盟國一樣難辭其咎。對不熟悉歷史的一般大眾來說，有時候真的很難去判別這樣的一本歷史著作究竟是出自學院中專業的史家之手，或只是單純喜好歷史寫作之業餘者的塗鴨。猶太史家稱這群人為「大屠殺的否認者」，但是他們自認為是「歷史修正主義者」，像大衛·歐文（David Irving）就明白表示他是「歷史修正主義者」。^⑩也由於「歷史修正主義」一詞被這群人佔用，導致這個概念被定型化，於是「歷史修正主義」一詞便用以專指那些以懷疑態度處理納粹時期歷史的學者。

「歷史修正主義者」這個字對不同的人來說，有不同的涵意，但都傾向於貶損。「修正主義」經常被譴責，因為它變成了一種「隨波逐流」或是「譁眾取寵」的代名詞。多數史家可以接受自己的著作被批評為「帶有修正主義傾向」，卻不願被貼上「修正主義者」的標籤。學術界經常被二分法劃分成保守與激進、左派與右派，在兩岸三地的輿論市場，「歷史修正主義者」通常指稱右翼的學者，在日本指的是那些否認戰爭罪行、主張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或是以言辭煽動民族主義的政客或學者；在歐洲則專指「否認」Holocaust（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納粹對猶太人所進行的種族大屠殺）存在的一群研究學者，批評者稱他們為「新納粹」（neo-nazists）。中國大陸的學者尤其愛用這樣的聯結，事實上，這根本是兩回事。首先，歐洲的歷史修正主義者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相當自負，從不遮掩自己的立場和言論，有些學者甚至因此官司纏身，^⑪他們認為他們的研究才是歷史的真相，Holocaust 已經被建構成猶如宗教體系的迷思，他們要加以解構。這些人多數不是德國人（福里松是法國學者、歐文是英國學者），也不是反猶主義者，更不是民族主義者。然而，以日本「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成員為主的歷史修正主義者則幾乎都是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歷史書寫考量的是民族的尊嚴，要如何重建日本的「大和魂」，因此要儘量淡化或刪除負面的教材，如慰安婦、戰爭責任與南京大屠殺等事件。歐美的歷史修正主義屬於學術研究的範疇，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卻是典型的民族主義。

註⑩ Richard J. Evans, *Lying About Hitler: History, Holocaust, and the David Irving Tria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p. 145.

註⑪ Michael Collins Piper, *Best Witness: The Mel Mermelstein Affair and the Triumph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m*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Historical Review, 1994), p. 13.

由於 Holocaust 的研究者採用了「歷史修正主義」一詞，導致這個字的意義被窄化，加上有關這個議題的資訊出現嚴重的偏頗，以致於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或歷史方法論的歷史修正主義已不具任何研究的意義。歷史修正主義所處理的議題可以再討論，也應該有較正面的價值，但是，如果連研究的方法和過程都遭受質疑，研究的結果自然沒有任何可信度。一旦「典範」崩解，自然就會滋生出許多「觀點」，每種「觀點」都受意識型態、文化素養、時代精神，乃至性別年齡所制約。歷史修正主義也許可以看作某種形式的「多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與民族主義原本是不相容的兩種意識型態，卻在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的運動中相互為用，開花結果。原因其實也很簡單，正如人類學家克里夫得·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詮釋》一書最常被引述的一段話：

相信韋伯(Marx Weber)所說，人是懸浮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文化就像那些網，因此，對該文化的分析便不是一種追求律法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尋求意義的詮釋科學。^⑫

教科書的爭議也不過就是如此，要塑造一種「觀點」、一種歷史事實的詮釋，問題的癥結只是誰該擁有這種詮釋的權力？中國與日本？或者所謂「公正的」第三者？

叁、教科書修改與新民族主義

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曾說：「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事，但使用哪一版本則由人民決定」。^⑬強調多元價值是現代民主社會的表徵，教育則是這種精神最直接的反映。在專制的集權國家，歷史只有一種版本，因此不會有爭議，也沒有人敢提出異議。但是，在民主國家中，教科書自由化是時代潮流，任何的歷史書寫都不能抽離它的時空背景，否則便不具意義和效用。^⑭美國著名史家哈洛德·魯格(Harold Rugg)在《哈洛德魯格教科書》(*The Textbooks of Harold Rugg*)中提出這樣的警示：「抨擊教科書是件容易的事，公平地加以評價卻相當困難」。^⑮《時代雜誌》也說：「中國與南韓嚴詞抨擊日本在歷史教科書中掩飾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殘酷暴行，這樣的指控不無虛偽的成分，中國和南韓的教科書也絕對稱不上歷史精確性的典範。」^⑯

註⑫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5.

註⑬ From Wikipedia, "Historical revisionism," <<http://www.answers.com/topic/historical-revisionism?hl=historical&hl=revisionism>>

註⑭ Harold Rugg, *That Men May Understand: An American in the Long Armistice*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1941), pp. 91~92.

註⑮ 轉引自 Gary B. Nash, "The History Standards Controversy and Soci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29, Issue 1 (Fall 1995), p. 42.

註⑯ Anthony Spaeth, "Textbook Tensions," *Time*, Vol. 165, No. 16 (April 25, 2005), p. 16.

基本上，不應將教科書的內容當作外交角力的籌碼，這是一個歷史書寫的問題。換句話說，是一個在後現代主義下對史家能否忠實地呈現歷史「事實」的質疑。遺憾的是，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者竟用以作為建構民族主義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在美國佔領當局（1945-52）的主導下，對日本體制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影響較大的除了「和平憲法」（日本國憲法）的制定外，便是教育體制的改革，尤其是教科書內容的選擇與書寫。以1946年版的小學、初中和高中教科書為例，對日本軍隊在二次大戰中的侵略行為，包括死亡高達三十萬人的南京大屠殺都有明確的記載。這樣的教科書看在不願承認戰敗，否認戰爭罪行的日本人眼裡，確實有嚴重的「傾向性」，不利於民族自信心的建立，因此非加以改變不可。1956年日本政府公佈地方教育行政組織及營運法，賦予文部大臣更大的權限，並在這一年開始實施教科書檢定制，強化對教育內容的控制。也因為這樣導致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家永三郎因自己所編寫的教科書檢定不合格，提出三次「教科書檢定訴訟」，控告政府教科書檢定制違法及違憲。^①像家永三郎的學者愈來愈多，為了突破教科書檢定的標準和規範，他們大多以玩弄文字的方式改寫原有的教科書，想要為日本在戰爭中所犯的罪行漂白。不過，在日本憲法的約束下，教科書內容的修改仍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70年代的日本大致上還是保守主義時代，雖然右翼勢力逐漸抬頭，但是未能引起社會的共鳴。知名作家三島由紀夫跑到自衛隊營地切腹自殺，想藉此喚起日本的國魂，卻引來陣陣嘲笑。進入80年代後，整個情勢開始改觀。隨著日本經濟的進步日益明顯，一種新的民族優越感也跟著出現，1984年11月17日朝日新聞上一則報導說，日本人大都認為自己比西方人優越。許多知名的新聞人物，像石原慎太郎、江藤淳和清水幾太郎等，為投合這種新的自豪感，都主張日本應取得與其新的經濟力量相當的軍事力量，並應當在世界上扮演一種獨立的政治角色。他們批判戰後體制，攻擊「和平憲法」，清算戰後以來日本人所秉持的價值觀。這股「政治國家主義」到80年代末達到高峰，^②石原慎太郎與新力公司總裁盛田昭夫合著的可以說不的日本（「NO」と言える日本）在1989年出版，^③一時洛陽紙貴，在美國相當暢銷。不過，這種趨勢對教科書的編撰並未起太大的作用。1982年所出版的歷史教科書，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和中、韓兩國的抗議，導致首相鈴木善幸出面道歉，承諾要約束教科書的編寫內容，並致力改善與鄰國的關係。加上1989年法院判定家永三郎的訴訟敗訴，對想要藉由改寫教科書以激勵民族主義的右翼分子來說，不啻是一大打擊。

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神話破滅，國內經濟長達十餘年徘徊不前，甚至出現負成長。加上自民黨主政下的政治黑暗，官僚腐敗事件層出不窮。失業率與犯罪率年年增高，社會的不安帶來民衆對政府的不信任感，造成8年之間換了7位首

註① 楊思偉，*日本教育*（台北市：商鼎文化，1999年），頁21、243。

註② 參閱 Kenneth B. Pyle 原著，傅曾仁譯，*日本的問題*（台北市：金禾出版社，1996年），頁61~68。

註③ 此書原出版於1989年，在美國很暢銷，盜版很多，有授權的英譯本為 Shintaro Ishihara, *Japan That Can Say No*, English Edition (Tokyo: Simon & Schuster, 1991).

相。^{②①}日本面臨的問題令政府與政治領袖都感到束手無策。有鑒於此，日本政客紛紛倡言「日本改造計劃」，像是小澤一郎的**日本改造計劃**。^{②②}這些著作的共同之處就是要將國民的不滿情緒從國內引導到國外，利用民族主義來恢復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在自民黨內部甚至成立了「歷史檢討委員會」，要對「大東亞戰爭」作一次全面的審視與總結。除此之外，更要推動一場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國民運動」，徹底改變日本全體國民對歷史的認知。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一個國家處於經濟衰退、政治混亂、政局動蕩之時，往往就是民族主義興起的時機，90年代的日本情況正是如此。

1995年7月，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為首的一群知識份子開始大肆鼓吹「自由主義史觀」。這種史觀認為戰後日本的歷史教育來自美國佔領當局改造日本思想計畫的「東京審判史觀」，和基於原蘇聯國家利益的「共產國際史觀」，並在這兩種史觀的基礎上形成了否定日本國家的歷史意識。因此，應在國民中間進行對本國歷史充滿自豪以及值得驕傲的「教育」，而不是上述否定明治維新以來歷史的「自虐史觀」、「黑暗史觀」。這些人所組織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從1996年1月15日起開始在**產經新聞**上連載「教科書中未教過的歷史」，美化日本侵略亞洲國家戰爭的歷史，並在當年底彙集成書出版，頗為暢銷。

1996年12月2日，「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發表創立聲明，並且在翌年1月30日正式成立。編撰會的成員除了編寫教科書外，也寫了一些著作，諸如西尾幹二的**國民的歷史**、小堀桂一郎的**再見吧！戰敗國史觀**和小林善紀的**台灣論**等。2000年4月，「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的會長西尾幹二和副會長藤岡信勝聯合向文部省提交**歷史與社會**兩部教科書的書稿，在該教科書「歷史研究是什麼」的前言中，作者以相對主義和種族中心論為訴求，並以文獻不足或者相對價值為理由，認為不可能認識和理解歷史事件的真相，從而否定許多爭議事件的真實性。這是一種典型的歷史修正主義手法，也是長久以來後現代主義對史家能否經由「敘事」還原「事實」的質疑。^{②③}一年之後，送審的教科書除了關於併吞韓國的兩頁建議刪除外，文部省不理會中國及韓國提出的修改要求，原案通過。^{②④}

教科書的修改反映了日本極右勢力的抬頭和新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小林善紀為主的這群人經常被批評為右翼分子，但是他們寧願稱呼自己是「新民族主義者」，原因是右翼在日本有著令人望而生畏、退避三舍的暴力形象。另外，民族主義也比右翼更具感召力。何謂「新民族主義」？^{②⑤}這是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日本的右翼思想能否

註②① 從平成元年(1989)到平成8年(1996)，共8年，從宇野宗佑到橋本龍太郎，計7位，海部俊樹與橋本兩度任首相，實際上共計9任。參閱「內閣總理大臣一覽表」，<<http://www.kantei.go.jp/jp/rekidai/ichiran.html>>

註②② 小澤一郎著，陳世昌譯，**日本改造計劃**（台北：聯經出版社，1994年）。

註②③ Tessa Morris-Suzuki, "Truth, Postmodernism and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n Japa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2, Issue 2 (Aug. 2001), p. 303.

註②④ Arnaud Nanta, 「日本：歷史修正主義者的攻勢」，**人權論壇**，<<http://www.creaders.org>>

註②⑤ 參閱 Louis L. Snyder, *The New Nationalis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5.

稱為「新民族主義」，仍是見仁見智的問題，畢竟日本的右翼和韓國的右翼就不太一樣。^⑤但是誠如陳光興教授所說，只有將日本的右翼思想放在歷史修正主義運動的脈絡下來理解，才能解開這波修改歷史教科書的爭議。^⑥換句話說，「歷史修正主義」乃是日本「新民族主義」的特色之一，不了解「歷史修正主義」就無法理解日本的右翼思想。歷史修正主義是手段，民族主義才是本質。

日本的民族主義發展歷史，大致上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分水嶺：戰前的民族主義和戰後的民族主義。戰前的民族主義結束於1945年的敗戰，大抵上以「天皇制度」及其共存的象徵和習俗為信仰中心。^⑦戰後的民族主義則可以再細分成兩種型態：^⑧第一種稱為「復甦的文化民族主義」，發展於1970到80年代，主要成員為受過教育的菁英分子。這種「文化民族主義」關心的是如何重新找回和重新界定日本的獨特性。第二種民族主義稱為「審慎的修正主義民族主義」，主張「舊民族主義」的某些象徵和思想仍有其正面的價值。^⑨在「和平憲法」的約束下，民族主義的言論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90年代以後，情勢完全改觀。波灣戰爭與大戰結束五十週年紀念，讓民族主義者重新思考日本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國家不再只是疏離的代理人，國家必須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里基·克斯坦（Rikki Kersten）將90年代以後出現的民族主義，尤其是以藤岡信勝為主的這群歷史修正主義者所倡議的理念定義為「新民族主義」。^⑩這種民族主義以國家為導向，也許譯成「國家主義」會更貼切。基本上，新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鄙視日本戰後的民主政治，藤岡曾哀嘆說：「戰後民主政治的理想是一個沒有威權的政府」，^⑪戰後的日本公民經常被迫在民主政治和集體認同之間作選擇。藤岡的「新民族主義」固然傳達了某些日本社會的信息，然而，他們這群人是否夠資格被稱作「新民族主義者」，仍是疑問，至少克斯坦是這麼認為。

「舊民族主義」與「新民族主義」的區分不在於他們的思想內涵，而是宣傳這些思想的時空環境。1991年的波灣戰爭是重要的刺激因素。藤岡指出，根據當時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85%的韓國人願意為國家而戰，但只有10%的日本人說願意做同

註⑤ 參閱Rikki Kersten, "Defining Neo-nationalism in Postwar Japan," Conference Paper, British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Studies Conference,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April 9, 1996.

註⑥ 陳光興，「日本右翼思想的台灣效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論壇*，<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taishe/frm_tw1_chenguangxing.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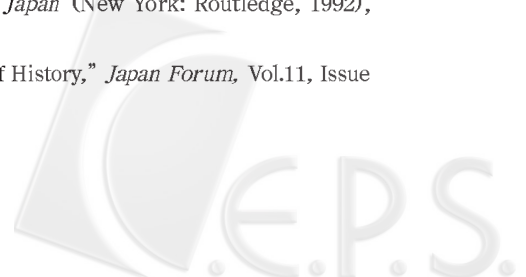
註⑦ 參閱 Ian Nish, "Nationalism in Japan," in Michael Leifer (ed.), *Asian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82-90.

註⑧ 猪口孝在「論民族主義的再主張」中，將日本當前的民族主義分成三個流派：天皇制的民族主義、回顧過去的民族主義和投射未來的民族主義。參閱猪口孝著，賴郁君譯，*日本：經濟大國的政治運作*（台北市：月旦出版社，1994年），頁168~185。

註⑨ Kosaku Yoshino,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203~204.

註⑩ Rikki Kersten, "Neo-nationalism and the Liberal School of History," *Japan Forum*, Vol.11, Issue 2 (Sep. 1999), p. 199.

註⑪ *Ibid.*



樣的事。^②在藤岡看來，如果沒有人願意為國家而戰，這樣的國家便不再是國家。藤岡的民族主義思想不同於其他的新民族主義者，如西部邁、吉本隆明，因為藤岡從來不談日本文化的優越性，甚至也不提「天皇制度」。在他看來，無國界的世界公民這種宣傳很吸引人，但是「國民」之所以稱為「國民」，因為有國家的存在。如果日本夠強大，而發生在亞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又不可避免，日本早已贏得勝利。為了宣揚「新民族主義」主張，於是成立了「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和「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藤岡很清楚亞洲的國家對日本的民族主義發展一直懷有戒心，國內也有很多人批判他們的言論。為了減低修改歷史教科書的阻力，他們不會在公開場合稱自己為民族主義者；身為學者，自由主義比任何意識形態更具普世價值，於是便用自由主義來包裝「新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向來是水火不相容的兩種意識形態。^③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使民族主義看起來有點惡名昭彰，霍布斯邦曾預言：「隨著民族國家的式微，民族主義也會逐漸消失」。^④可惜這個期望並沒有實現，二十世紀末蘇聯解體，東歐再度興起另一波民族主義的建國運動，^⑤民族主義依舊是一股避不掉的歷史力量，自由主義不得不與民族主義「共享榮耀」。^⑥藤岡信勝用「自由主義」來裝飾「民族主義」，他選擇這個字是經過仔細算計的。這個標籤也許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對當代日本的知識分子而言卻有無比的魅力，自由主義使「自由主義的史觀」變得更有價值。藤岡的「自由主義的」意味著以下的三個概念：有自主權的國家、自由與個人主義。他將這三種概念加以鬆散結合作為「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追求的願景，未來的日本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理想社會。

基本上，教科書的編寫是「家務事」，國際社會沒有干預的正當性，日本的右翼分子可以理直氣壯地抗議，此事不容外人置喙。中國政府也未必真的在意全國使用率不到1%的「新版」教科書能對日本民衆產生多大的影響力，^⑦何況日本國內反對的聲浪也很大，日本的進步團體和女性主義者在慰安婦的議題上也作出了貢獻，中國的解讀與抗議未免有點做作，與事實不盡相符。在日本「侵略」中國的這場戰爭中，中國死傷的人數何止千萬，某些戰役的慘烈情形不下於南京的屠殺。為何獨鍾情於「南京大屠殺」，恐怕是因為「南京大屠殺」已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圖騰」；民族主義是一種受害情結的表現，而「南京大屠殺」正好是抗戰八年中無助的一個階段，即

註② *Ibid.*, p. 200.

註③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1998年），頁53。

註④ 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92.

註⑤ 參閱 John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40~350.

註⑥ Yael Tamir,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

註⑦ *Wikipedia*, "Market Share of Government-approved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s," <<http://www.answers.com/>>

使中國打贏了這場戰爭，還是無法忘記最初的挫折。用現今比較通俗的話說，因為「南京大屠殺」有「賣點」，有其戲劇效果，因而成了中日關係中經常重播的劇情。

肆、南京大屠殺與網路民族主義

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原本是自己的事，之所以引發中國的關切和東北亞幾個曾經被日本侵略國家的抗議，起因於教科書刻意淡化日本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責任，否認許多殘酷的罪行，其中尤以「南京大屠殺」、「慰安婦」、「731部隊」的解釋最讓中國感到不滿。1982年6月通過審定的教科書將「侵略」改為「進出」，把「南京大屠殺」說是「事件」，把「慰安婦」說成「自願賣淫」，這種玩弄文字遊戲的歷史修正主義手法，除了引起世界輿論的嚴重關切和批判外，教科書問題也成了中日關係的障礙。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次以首相之尊參拜靖國神社，更激發中國的民族主義怒火。自此以後，二十年來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反日風潮總是圍繞在這兩個議題上打轉，不時有零星的暴力事件出現，到了2005年3月，終於釀成舉世注目的外交事件。

批判日本教科書的國家除了中國外，還有南韓與北韓，甚至連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德國都對日本「漂白」戰爭罪行表示不諒解。亞洲的國家都希望日本對侵略鄰國的事公開正式道歉，日本政府卻遲遲沒有行動，雖然偶而也是有一些政治人物會說出道歉的話，但總是被認為誠意不足。道歉解決不了問題，中國要的恐怕也不是道歉而已。日本首相小泉在2005年4月於印尼亞加達舉行的「亞非會議」上曾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亞洲國家造成的傷害道歉，然而在此之前卻有八十一位國會議員前往參拜靖國神社，這種兩面手法讓中國人難以相信日本是誠心地認錯。

中國特別喜歡打歷史牌，這兩個國家的歷史糾葛，短期內很難有突破性的改善。教科書引發的民族主義浪潮只是其中一環。在中國，反日是一種很容易發洩的情緒，2004年8月在中國舉行的「亞洲杯」足球決賽，中國球迷不能接受日本隊獲勝的事實，到處製造騷亂。2005年3月9日由北京發難，串連好幾個城市進行反日示威遊行，透過媒體不斷的報導，確實對日本造成極大的壓力，但是日本政府並沒有因此屈服，反而要求中國道歉，聲稱此種抗議運動充滿反日與種族主義偏見。日本的反客為主讓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要求——「道歉」和「賠償」更難實現，對當今想要再度躋身世界強國的日本來說，已愈來愈不可能。

反日風潮雖然起因於教科書的修改，但是國際觀察家都心知肚明這只是中國政府的策略。在抗議剛發生時，公安並沒有積極介入維持秩序，雖有零星的暴力事件和對日人財產的傷害，也都在控制的範圍內。國外媒體的報導較詳盡，中共內部則除了國營媒體外，消息還是封鎖的。在網路的聊天室中，有關抗議的話題要經過檢查，許多大學不准學生離開校園，接近群眾聚集地方的大眾運輸工具則短暫關閉。中共顯然玩弄兩面手法，像在北京這個地方具有國際觀瞻的宣傳效果，就放任學生去遊行，清華與北大的學生甚至接到校方當局的電話敦促他們加入示威活動。反日風潮到了2005年

4月中以後慢慢消退，**人民日報**連續幾天撰文呼籲示威群眾冷靜，公安單位甚至宣佈「遊行已觸法」。^③種種作為顯示中共不願讓這種民族主義情緒過度發酵。民族主義是一把雙面有刃的劍，^④稍為使用不慎，終將傷害到自己。

當中國以「歷史修正主義」來譴責日本的教科書編撰同時，國際上對中國自己的歷史教科書也有微辭。例如，在教科書中對日本與西方等外來勢力的奸詐大書特書，對毛澤東的大躍進造成大約三千萬中國人死亡、1962年的中印戰爭或1979年中國入侵越南，卻很少提到，西藏問題更是只能靠西方媒體提供訊息。^⑤美國「國家公共電台」(US National Public Radio)在2005年4月9日的播放中說，中共所以允許教科書的爭議不斷被渲染，存有多重的政治利益考量。^⑥換句話說，教科書爭議只是中國與日本交涉的手段，或者說只是一種籌碼。中共總理溫家寶在4月3日接見日本外相川口順子時說，如今的主要問題是日本政府做了許多傷害到中國人民感情的事，特別是他們的歷史論述。這種所謂的「感情的事」，其實就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不是非要不可的東西，也許會影響東亞國家之間的關係，但只要這些國家依然保持經濟往來，民族主義就很難發揮破壞的作用。正如美國智庫的布拉德·格羅斯曼(Bernard M. Grossman)所說：「這就像一場拳擊賽，當兩個人抱在一起時就很難出拳」。^⑦密切的經貿往來的確可以讓敵對的國家暫時擱置政治議題，雖然民族主義未曾消失，但是不會浮現台面，只有當經濟問題也變成政治議題時，民族主義才會被用來推波助瀾。

中國選擇在此時打民族主義的牌，主要是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的考量，另外，與北京新的領導群體調整外交思維，以及凸顯施政新理念也有一定的關係。自90年代初以來，一連串的外交事件，逐漸改變中國人對世界的觀感。首先是蘇聯解體，中國人認為美國背棄了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1993年北京申請2000年奧運失敗，也將矛頭指向美國，對美國不諒解。在80年代時，中國人對美國的態度大致上是正面肯定的，至此則完全改觀。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五十週年紀念、1995-96年的台海危機、1996-97年對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狂熱、以及一些反美與反日出版品的熱衷，使群眾民族主義變得更堅固。在1999年5月初美軍誤擊中國駐巴格達大使館和2001年4月1日的偵察機撞機事件後，曾經被視為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再度在一般的老百姓中獲得廣泛的支持。對二十一世紀的這波民族主義，格里斯(Peter Hays

註③ Jim Yardley, "China Puts Brake on Anti-Japan Protest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3, 2005, <<http://www.ih.com/>>

註④ 這是湯姆·奈恩的「雙面神」(Janus)理論，即民族主義有健康的一面，也有病態的一面；既是進步的，也是倒退的。後人喜歡加以引伸為是一把雙面有刃的劍。Tom Nairn,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of Neo-Nationalism* (London: NLB, 1981), pp. 347~348.

註⑤ Fred Fiatt, "China's Selective Memory,"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8, 2005), p. A17.

註⑥ Jennifer Ludden and Rob Gifford, "Chinese Protest Japanese Texts On World War II,"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4584435>>

註⑦ 轉引自「時間是治癒創傷的良藥，但在東亞例外」，*大紀元*，10/8/2004, <<http://www.dajiyuan.com/gb/4/10/8/n684649.htm>>

Gries) 稱之為「新民族主義」。^③

格里斯指出，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中國新民族主義最大的特徵是：構成分子主要是共和國的第四代，目前正處於 30 歲左右的青年。這一代人沒有走過革命的戰火，也沒有受過西方帝國主義的凌辱，「文革」與「大躍進」也沒有對他們產生影響，他們這一代生活在改革開放的富裕環境，為何對民族主義會有如此強烈的感情呢？普遍的觀點都傾向於認為這是中國當局自 90 年代以來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結果，但格里斯認為這並非真正原因。他廣泛考察了當前中國的各種「文本」——包括電影、電視、海報、漫畫等，尤其是 90 年代初以來的暢銷書和雜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新民族主義興起的根本原因是第四代的中國人想要通過愛國主義來突出自己的聲音。

與日本的新民族主義一樣，中國的新民族主義者也帶有歷史修正主義的傾向。第四代的民族主義者都自覺地將自己與 80 年代的「自由派」劃開界線，甚至對之抱持敵意。他們認為，那些自由派是一群危險的浪漫主義者和激進分子，而他們自己則是擁護穩定和秩序的現實和實用主義者。一個非常戲劇化的例子就是，1989 年北京學生打出的標語極端歌頌民主，而 1999 年參與遊行的學生卻將自由描繪成惡魔。現實主義成了新民族主義的表徵，這種民族主義無法與五四或中日戰爭時的民族主義相提並論，甚至無法與「義和團」運動相比。中國內地許多報章將這種民族主義取名為「網路民族主義」，意思是來得快，去得也快，除了一些來自中日歷史遺留的問題外，大部份的議題都無法持久。

作為一個歷史遺留的問題，在 1972 年以前，沒有人關心「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毛澤東極力想與日本關係正常化，自然不許人民談論此議題。若非 1982 年日本教育當局限制教科書對此議題的編寫，引發日本國內對「南京大屠殺」一事真相的再探討，「南京大屠殺」可能只是另一個歷史名詞。到 90 年代初，無論日本學界或中國學界，大致上都接受有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問題只是規模、人數、以及如何定義「屠殺」這個字。江澤民上台後，努力要讓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緊鄰的日本是最大的合作伙伴、競爭對手，也是潛在的威脅。尤其是當日本與美國修好結盟，台灣逐漸向日本靠攏，釣魚台的主權爭執不下，造成中日之間的衝突日益嚴重，加上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的抬頭，更讓中國的民族主義一發不可收拾。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向來擅於操弄民族主義，尤其是當今共產主義已不再能吸引人心之時，只好再度訴諸於民族主義以鞏固其統治中國的正當性，不論是舊民族主義或新民族主義，都與中國共產黨脫離不了關係。^④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正當性主要來自於他們一貫堅持抗日，並獲得最終的勝利，在他們看來，如果不是國民黨的阻撓，錯失抗戰的時機，也許不會有「南京大屠殺」。因此，譴責「南京大屠殺」與南京大屠殺的修正主義者，一方面用以警示日本對中國的虧欠，另一方面則與國民黨爭奪現

註③ 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California: The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18.

註④ John Derbyshire, "Understanding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Washington Times*, March 7, 2004, <<http://www.washtimes.com/books/20040306-102116-9387r.htm>>

代史書寫的正統。「南京大屠殺」被化約成抗日戰爭的意象，用它作為中日交涉的籌碼是最方便的「制勝絕招」，除了它的知名度之外，高達二至八萬的婦女被強暴然後殺害的記載，最容易激發一種屬於男人的民族主義。1997年中國裔的美籍作家 Iris Chang（張純如）出版《南京之姦淫》，一時洛陽紙貴，成為最佳暢銷書籍。^⑤張的書引發正反兩面的不同評價，尤其是書名用了「姦淫」（rape）這個字，更容易激起兩邊的民族情感。張在三十六歲時因憂鬱症自殺（謠傳被日本右翼分子暗殺），原因竟是因為「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太折磨人。^⑥

伍、慰安婦與女性主義

在日文中慰安婦是賣淫的婉轉說法，專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方在佔領區內的軍中妓院，因此也名為「從軍慰安婦」，如今日本已不用這個名詞。最早的「慰安所」始建於南京大屠殺之後，可能是因為日本軍方發現軍人的強暴事件層出不窮，得性病的人愈來愈多，若不妥善管理，這場戰爭根本不用打了，才有這樣的構想。根據林博史教授的研究，^⑦充當慰安婦的人種中，包括日本人、韓國人、中國人（含台灣人）、馬來人、泰國人、菲律賓人、緬甸人、印尼人、越南人、印度人、歐亞混血、以及太平洋列島的土著，總人數不易估計，有低到二萬的，也有高到三十萬的，以上野千鶴子的八萬到二十萬較合理。^⑧其中尤其以韓國人為最佳慰安婦人選，因為韓國自1910年以後便是日本帝國的「子民」。

從30年代開始，慰安婦的存在便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六十多年來，慰安婦經常被人描述成「愛與性」的情事，直到90年代女性主義運動出現，以及許多倖存的慰安婦打破沉默，挺身出來指控日本軍方的罪行，慰安婦才成為眾人討論的議題。當日本即將潰敗之時，慰安婦大多被殺害或棄置，多數選擇落籍他鄉，少數返鄉的人也不敢提起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日本的侵略成功地讓受害者「噤聲」。1990年，在許多日本團體的協助下，韓國的慰安婦集體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要求日本道歉和賠償。這場官司連續打了好幾年，雖然沒有預期的結果，不過，仍然有助於讓日本了解慰安婦的問題，並且爭取上國際媒體的版面。

日本政府始終不承認軍方參與了慰安婦的經營和運作，宣稱戰時妓院都委由私人承包。這個謊言在1992年時被史家吉見義明揭穿，他在日本國防機構的檔案室中找

註⑤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Un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Penguin, 1997).

註⑥ Connie Matthiessen, "Chang, Interrupted," <http://www.sanfranciscomagazine.com/home/view_story/242/>

註⑦ Hayashi Hirofumi, "Japanese Comfort Women in Southeast Asia," *Japan Forum*, Vol. 10, No. 2 (1998), <<http://www32.ocn.ne.jp/~modernh/eng04.htm>>

註⑧ Ueno Chizuko,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ation, Individual and Self," *History and Memory*, Vol. 11, Issue 2 (Fall/Winter 1999), p. 130.

到了軍方直接參與經營妓院的證據。^④自此以後，日本官方才改口承認有道德上的責任，但沒有法律上的義務；儘管如此，還是給日本當局造成極大的壓力。在 1995 年時，日本設立了「亞洲婦女基金」(Asia Women's Fund)，想以金錢補償進行和解，首相村山富市致詞時除了保證日本會記取教訓，並向每位慰安婦表示歉意。無奈，慰安婦不領情，原因是該基金會本質上是非官方的，慰安婦要的是公開的正式道歉和補償。這問題目前還是僵持不下，但時間在日本手中，估計目前倖存的慰安婦只剩數千人，一旦凋零殆盡，慰安婦的真相便會石沉大海。

紀爾茲曾說，我們生活在「事實之後」(“after the fact”)，^⑤倫敦國王大學戰爭研究系的教授史密斯(M. L. R. Smith)也說：「每一種現象的週遭總是圍繞著一個巨大的迷思」、^⑥「我們是迷思的製造者，當歷史發生時我們加以編排成我們想要理解的狀態。事件的本身讓人迷惑，而我們所講述的故事其實是我們自己的想像」。^⑦慰安婦正是這樣一個迷思，它像實驗室中的石蕊試紙，測試日本對戰爭責任的態度與公眾記憶的建構。顯然，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牽涉到社會與文化的爭扎，慰安婦議題不是單純的歷史選材問題，而是日本思想界的一場「記憶的內戰」，^⑧女性主義史家瓊安·史卡特(Joan Scott)給它一個名稱，叫作「歷史政治學」。^⑨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唯有承認慰安婦的錯誤才能修補日本與亞洲鄰近國家的外交關係。這個問題比較容易解決，畢竟外交牽涉到利益的交換，只要日韓關係和緩，慰安婦便不再是問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卻意外引發歷史研究方法論、女性主義與新民族主義的論戰。從 1970 年代開始，陸續有一些著作以批判性的眼光在討論慰安婦的議題，其中較著名的是千田夏光出版於 1973 年的**從軍慰安婦—その支配と差別の構圖**，^⑩她的結論是「婦女的境遇的確很可憐」。^⑪基本上，這是男性觀點的研究，他所使用的資料和訪談幾乎都來自曾於戰時服役的男性，只訪談了少數幾位日本籍的慰安婦和兩位韓國籍的慰安婦。儘管如此，這本書仍是個里程碑，開啓了女性主義觀點的慰安婦研究。不過，真正宣告女性主義時代來臨的則是新聞記者(也是女性主義者)松井やより，她在**朝日新聞**上連續寫了很多文章，從此點燃了主流報紙對女性主義與

註④ Yoshimi Yoshiaki,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2~75.

註⑤ Clifford Geertz, *Al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註⑥ M. L. R. Smith, “The Trouble with Guns… and Academic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2, Issue 4 (Oct-Dec 99), p. 363.

註⑦ *Ibid.*, p. 364.

註⑧ Ueno,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ation, Individual and Self,” p. 132.

註⑨ Joan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

註⑩ 千田夏光，**從軍慰安婦—その支配と差別の構圖**(東京：雙葉社，1973年)。

註⑪ Yoshiko Nozaki, “I’m Here Alive: History, Testimony, and the Japanese Controversy over ‘Comfort Women’,”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Vol. 1, Issue 1 (August 17, 2005), paragraph 7, <<http://worldhistoryconnected.press.uiuc.edu/1.1/nozaki.html>>



慰安婦議題的討論。^⑦女性主義者以慰安婦議題作為踏腳石加入教科書的論戰，除了造成這場論戰產生質變外——從政治與外交的範疇變成人性與道德範疇，也牽扯上民族主義與性別的關係。

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在論述「性別與民族」時說，早期的女性主義者很少分析種族特點與民族主義的問題，但從80年代中期以後，這方面的文獻就愈來愈多。性別理論家經常抱怨民族主義的理論未能關照婦女在民族計畫中的角色地位，以及性別的區隔如何影響人們對民族與民族主義的理解。^⑧基本上，女性主義是反民族主義的，它要超越民族的疆界，成爲一種普世價值。誠如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所說：「身爲女人我沒有國家，身爲女人我不想要國家，身爲女人我的國家就是這個世界」。^⑨女性主義在國家的認同上明顯與新民族主義不相容，對一心一意想要重塑「國民的歷史」的新民族主義者而言，慰安婦的存在是個陰影，不利民族自尊的恢復，因此必須應用歷史修正主義的手法將它否決掉。但是，日本的女性主義者卻堅持將它放入教科書中，作為女權運動的反思教材。

在提供給孩童和青年的歷史教材中，經常可以發現以「政治正確性」爲導向的修正主義運動。這種類型的修正主義處心積慮要限制歷史中讓人不愉快的一面，怕它們會引起爭議或傷了某些人的感情。例如，在某些美國學校中，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演說從來不曾完整地刊載，身爲黑人的金恩，經常在他的演說中使用例如「黑人」（negro）這種種族的詞彙。對日本的修正主義者而言，慰安婦議題之所以不適合放入教科書中，理由是慰安婦呈現的是兩性關係的黑暗面。女性主義者則宣稱這是很荒謬的論述，日本的中學生沒有想像的純潔無瑕，在各種色情資訊充斥的媒體中，性早已不是禁忌話題。何況性本身也是人類諸多關係中的一個環節，不是壞事。今天南亞的許多國家，賣淫的女性多是十幾歲的女孩，我們其實更應該在教育中告訴孩子身體的價值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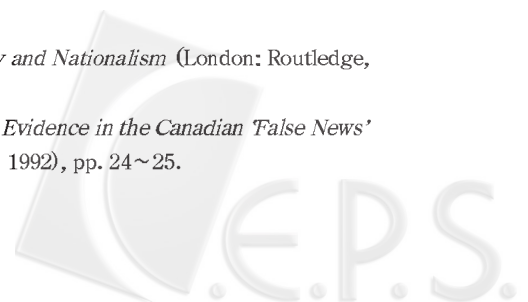
既然道德考量不足以說服人心，歷史修正主義者轉而利用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主張，認爲沒有足夠的文獻史料證明慰安婦的存在事實，倖存者的證詞太薄弱，可信度讓人懷疑。手法就跟 Holocaust 的歷史修正主義者一樣，因爲找不到希特勒下令根絕猶太人的文件，因而否認「大屠殺」的存在。^⑩女性主義者則採取「經驗論」（empiricism）的研究方法，透過訪談的口述歷史，從經驗法則上肯定慰安婦的存

註⑦ 松井やより於2002年12月27日因癌症病逝東京，享年68歲。Mutsuko Murakami, "Pioneering Journalist Yayori Matsui Dies," <<http://www.fccj.or.jp/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category=2&start=0&articleid=102&start=150>>

註⑧ Anthony Smit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205.

註⑨ 轉引自 Rick Wilford and Robert L. Miller, *Wome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1.

註⑩ Barbara Kulaszka, *Did Six Million Really Die: Report of the Evidence in the Canadian False News' Trial of Ernst Zündel-1988* (Toronto: Samisdat Publishers, 1992), pp. 24~25.



在。但這樣做反而落入民族主義者的陷阱，讓慰安婦的見證攤在媒體面前接受質疑，不啻是二度傷害，女性主義者也覺得情何以堪。日本的右翼政治勢力成功地運作媒體，壓迫多家出版商在 2002 年版的高中教科書中隻字不提慰安婦。^①由於愈來愈多的慰安婦出現在媒體上，經驗論似乎佔上風，但也由於人數太多，出現記憶的落差，民族主義者便在這些細節上窮追猛打，令女性主義者難以招架。於是開始有評論家建議以新的後現代方法取代現行的經驗主義，日本著名的女性主義者上野千鶴子便是其中一位。

上野引用「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理論說，慰安婦的議題基本上是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難道歷史的「事實」(facts)是如此單純且一層不變以致於看在任何人眼裡都一樣嗎？^②在上野看來，實證主義的方法過度依賴書寫的歷史文獻作為歷史研究的首要資料，完全漠視受害者證詞的「證據效力」，像約翰·拉貝(John Rabe)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日記，是很重要的親身見證，卻被批評為不足採信，理由只是因為那是「私人的」文件。^③上野主張應該承認歷史的多樣性，亦即「多元論」史學的存在，如此方能關照到個人所認知的歷史「現實」(reality)。上野對「見證」效力的強調立刻遭遇同為史家的吉見義明的挑戰，吉見認為歷史的「事實」須經由各種資料(包括檔案文件、證詞和其他的物質證據)予以重建，歷史的理論和方法只是歷史分析和重建的器具。重建後的歷史需要再評估，看看有無說服性，合不合邏輯，也就是說再一次的「確認」。^④若依照上野的說法，歷史便無所謂「事實」與「真相」，有的只是由各種觀點所建構的「現實」，「觀點」成了主宰歷史研究的唯一因素。

如果歷史研究不是呈現「事實」，女性主義者有何理由批判新民族主義的修改教科書。「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成員極力要建構一種「日本人觀點」的「國民的歷史」，甚至有時為了論述的統一性和連貫性，不惜曲解史實，也不過就是一種「觀點」。歸根究底，歷史修正主義只是一種「觀點」，女性主義也是一種觀點，一種歷史的「版本」而已。日本的女性主義者想要跳脫國家的框架，追求一種不同於民族主義的史觀，她們譴責慰安婦的存在，不是因為日本政府或日本軍方所犯的罪，而是因為這種行為侵犯女性的人權，若要談責任的歸屬，一切都是戰爭，戰爭才是真正的罪行。女性主義通常都反對戰爭，不鼓勵愛國主義，除了容易被貼上「綏靖主義者」(pacifist)的標籤外，更成為右翼民族主義撻伐的對象。民族主義原本就是男性的象徵，^⑤

註① 參閱 Yoshiko Nozaki, "Japanese Politics and the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y, 1982-20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 37, No. 6&7 (2003), pp. 603~622.

註② Ueno,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ation, Individual and Self," p. 133.

註③ John Rabe, *The Good Man of Nanking: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trans. by John E. Woods (New York: Vintage, 2000).

註④ Yoshiko, "I'm Here Alive: History, Testimony, and the Japanese Controversy over 'Comfort Women'," paragraph 28.

註⑤ Smit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p. 208.

辛西雅·安羅 (Cynthia Enloe) 說：「民族主義典型地來自於男性化的記憶、男性化的受辱和男性化的希望」。^⑥在日本當代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女性向來沒有地位，「靖國神社」根本就是男人的「天堂」。

然而，女性主義就沒有國家認同嗎？至少在慰安婦的議題上，答案是否定的。在亞洲，女性主義運動依舊無法超越民族國家的框架。1995年秋，聯合國在北京召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會中上野千鶴子大聲疾呼，不要讓慰安婦議題成為南韓與日本政府進行國家利益談判的工具，希望日本與韓國的女性主義者要共同克服民族的界限。未料此一提議遭致韓國女性主義者的強烈抗議：「我們的國家被妳們國家的軍人侵略，妳怎能要求我們跨越民族的藩籬」。^⑦正如西方的女性主義明顯帶有種族優越感的思考，亞洲的女性主義也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日本的女性主義者無法在慰安婦的論述上尋求被日本侵略國家女性主義者的支持，關鍵在於慰安婦是日本特有的，是一種以國家的力量所進行的組織犯罪，不同於一般的「賣淫」或「嫖妓」問題，因此與女性的權力被侵犯無關，而是國家的尊嚴受到侵犯。這種意識型態尤其表現在韓國的民族主義者身上。

女性與民族主義並不抵觸，但必須先轉換角色，英文的「祖國」拼成 Motherland，不是沒有道理。尤瓦一戴維斯 (Nira Yuval-Davis) 對性別與民族主義有獨到的見解，在與安西雅斯 (Floya Anthias) 合編的《女人—民族—國家》一書中，她將解構主義 (deconstructionist) 的分析法應用於性別與民族的關係，肯定女性在民族建構中的意識型態和象徵價值，並因此歸納出應該從五方面來定位女性，^⑧其中最重要的是作為文化再生的構成要素，是種族淵源的集體象徵。在許多文化中，女性都以母親的姿態出現。1974年土耳其入侵賽普勒斯 (Cyprus) 後，經常可以在路邊的海報中看到一位哭泣難民母親的形象，象徵賽普勒斯人在土耳其入侵後的集體痛苦和憤怒。^⑨許多民族主義的故事都要求男人要護衛民族的女人，召喚男人為其女人和孩子而戰，女人經常被建構為集體認同的承載者。「南京大屠殺」之所以讓中國人生氣，不是因為普通老百姓被殺害，而是小孩與女人受到侮辱，女人的受辱象徵著男人尊嚴的受損，最容易激發民族主義的同仇敵愾。吳三桂的「痛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雖然是小說情節，也未必沒有道理，或許可以說明這種女性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日本的女性主義者將慰安婦議題「泛化」成人性的問題，某種程度上也是歷史修正主義的手法，如同用「現代性」理論來解釋 Holocaust 的道理一樣，^⑩尤其是使用「慰安婦」（英文譯作 comfort women）一詞，已剝奪了這些被性奴役的受害者要求

註⑥ 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Pandora, 1989), p. 44.

註⑦ Ueno,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ation, Individual and Self," p. 145.

註⑧ Nira Yuval-Davis and Floya Anthias (eds.), *Women-Nation-State* (London: Sage, 1989), p. 7.

註⑨ Nira Yuval-Davis, *Gender and Nation* (London: Sage, 1997), p. 45.

註⑩ 參閱羅志平，「論 Holocaust 的研究與族群和解」，*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4期（2005年7-8月），頁27。

平反的正當性。小林善紀在《台灣論》中引述許文龍的話說，慰安婦是出於自願，^①就是要摧毀這些女性在民族主義象徵意涵中的「純粹性」，因為，沒有「純粹性」就沒有「正當性」。所有出現在媒體面前的受害者都誓言她們是被強迫的，在民族主義的壓力下，「自願」形同叛國，是不會被寬恕的罪，可是，誰又能證明他們不是自願，假如所有的證據都被摧毀，只剩下「證詞」，那麼，所謂的「事實」就會變成只是個人的「觀點」。歷史修正主義者成功地活用了後現代的語彙——「歷史如小說」，讓受害者的「證詞」變成無法驗證的記憶。重建的記憶只能當作「故事」看，絕對不是歷史。因此，女性主義的論述是一種「觀點」，民族主義的論述也是一種「觀點」，整個戰後日本慰安婦研究就只是在闡釋這樣一個「觀點」：歷史的解釋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動態的，一直處於流動之中。^②

陸、結 論

在一個全球化的實質世界，我們與歷史的關係正在改變，改變的部份原因來自我們藉以面對過去的媒體本質。今日的我們比以往有更多接觸歷史知識的管道，包括教科書、新聞影片、漫畫書籍、博物館、歷史主題公園和越來越多的電子媒體如網際網路。經由這種萬花筒與馬賽克的結合，我們拼湊出對當前世界的理解。媒體的變遷已經根本改變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換句話說，當代的歷史危機部份原因來自媒體。^③誠如海頓·懷特（Hayden White）所說，Holocaust 或廣島的「核爆」這些歷史事件的本身影響太大，已無法單純以「敘事」的方式加以表達，^④文本方式的教科書已經無法適切傳遞歷史知識，反而容易成爲掌控權力者灌輸人民意識型態的工具。

基本上，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的爭議至少涉及三個層面。

一、就歷史教科書的編撰而言

從這次的爭議來看，我們發現民族主義是新版歷史教科書的核心價值，民族認同可以建構，民族主義更是在既有的制度與意識型態框架上被建構出來的。^⑤藤岡信勝、小林善紀與石原慎太郎等人的主張可以當作只是一種「觀點」，不須太過在意，歷史上不乏比他們更極端的言論。然而，他們選擇以教科書的編撰作爲途徑來建構民族主義卻值得我們深思。在他們看來，教科書既然是經過政府認可發行，或多或少代表了

註① 小林善紀，《台灣論：新傲骨精神宣言》（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頁101、203~204；《第二波台灣論》（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頁143。

註②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p. 5.

註③ Tessa, "Truth, Postmodernism and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n Japan," p. 298.

註④ Hayden White, "The Modernist Event," in Vivian Sobchack (ed.), *The Persistence of History: Cinema, Television and the Modern Even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7~38.

註⑤ David Brown, *Contemporary Nationalism: Civic, Ethno-cultural and Multi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20.

某種程度的官方態度。對中學生來說，無所謂學術自由，只要是教科書中的內容都應該是真實的歷史，他們不可能質疑這只是編撰者的觀點。日本政府固然開放民間出版商編撰教科書，但是仍未放棄審查的把關責任，換句話說，能夠獲得發行的教科書，其內容仍在政府容忍的一定範疇之內。這正是中國政府抗議的地方，與教科書是哪些人編撰的無關。「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和「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不足以改變日本的教育政策，但是他們的新民族主義史觀將經由教科書傳達給日本的下一代。儘管目前該歷史教科書（扶桑社發行）的市場佔有率不到1%，但是書中的內容已經是無人不知。我們不能從「量」上去分析新版教科書的影響程度，必須從「現象」來觀察——例如倡議新民族主義者大多有一定的社會與政治地位、掌控了媒體、「聲音特別大」等，在媒體的廣告效應下，新版教科書顯然已成了重要議題，假以時日，新民族主義未必不會成爲主流思想。

二、就重建歷史「真相」而言

這是歷史修正主義的問題。對歷史修正主義者而言，歷史知識也是建構的，是經由多方面的觀點所拼湊而成的，重建的歷史「景象」（vision），充其量只是「逼真」（realities），不是「事實」（facts）。尤其是當研究者過度依賴倖存者或受害者的證詞時（「南京大屠殺」、「慰安婦」與 Holocaust 的研究都是如此），歷史敘事變成了記憶大考驗，再加上受「政治正確」的影響，於是歷史就成了「記憶政治學」。另外，歷史修正主義所用的方法也顛覆了傳統的本式敘事，喜愛看電影的人不難發現「好萊塢」（Hollywood）是當今歷史修正主義者的大本營。^⑥奧利弗·史東（Oliver Stone）的「誰殺了甘迺迪」（JFK）便是其中的經典，經過媒體的不斷轉切——「真實的」與「想像的」（例如，使用紀錄影片和戲劇化效果）——導致真實與想像二者之間的分際瓦解，結果是我們越來越不把歷史「事件」當作連貫的故事看待。史東明知道「華倫報告」（Warren Report）已經裁定甘迺迪的被暗殺背後沒有陰謀，卻仍在電影中刻意兜售一個「巴洛克式的謊言」（baroque lie）（意爲過度裝飾的）。^⑦對史東與許多不相信「華倫報告」的人來說，歷史修正主義讓司法也變成只是一個「觀點」。

三、就中日關係而言

中國之所以對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反應如此強烈，西方觀察家都心知肚明，這個問題與歷史無關，與教科書本身也無關，明白的說，這是一個國際關係的問題，歷史只是個幌子。歷史修正主義者將教科書議題炒作成國際新聞，爲的是要向世人宣示，不要忽視日本以其經濟實力成爲世界強國的事實。911 事件以後，美國被恐怖主義和

註⑥ Terrence N. Tice, "Historical Films," *Education Digest*, Vol. 60, Issue 4 (Dec. 1994), pp. 47~52.

註⑦ Christopher Sharrett, "Revisionism, History and Hollywood-historical Revisionism in Motion Pictures-Column," <<http://www.looksmart.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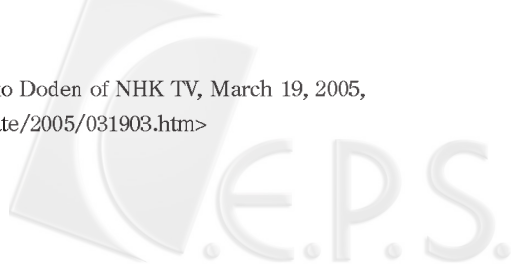
出兵伊拉克的問題弄得焦頭爛額，除了英國外，聯合國與歐洲的幾個大國都不認同布希總統的作法。日本自第一次波灣戰爭以後，一直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強力支持者，出錢出力，爲了伊拉克的和平，更首次讓自衛隊踏出國門。美國對日本的依賴與日俱增，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在接受日本 NHK 電視台專訪時說：「日本與美國的夥伴關係已經從區域性的合作擴大爲全球性聯盟」，認爲以日本對國際社會的貢獻，應當在聯合國安理會佔有常任理事國的席位。^⑧美國的政策無異是爲日本的民族主義者背書，美國扶植日本成爲世界強國，以便幫它分擔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教科書的修改反應了日本民族主義者體認到國際現勢已站在日本這一邊，這個趨勢會繼續下去，下一步將是修改和平憲法，爲了對抗北韓的核武威脅，至少美國不會反對。小泉首相在「原爆紀念日」的演講中說，日本會遵守憲法，致力於非核的世界，但是對戰爭這種和平的最大殺手卻未加譴責，不免讓人擔心日本的軍國主義會復甦。中國抗議教科書的修改也許有點虛張聲勢，但日本的軍事擴張肯定讓它擔驚受怕。日本的問題、台灣的問題，必然會有一個臨界點，何時到來，一方面要看中國的忍受度，另一方面也看美國有多大能耐解決日本與亞洲各國的關係。

誠然，歷史修正主義不是偉大的思想，也沒有偉大的理論家，無法和自由主義或馬克斯主義等意識型態相提並論，我們甚至無法明確地爲它作出定義。嚴格來說，這只是一種看待事情的態度，一種粗淺的相對論，不夠格當作學術研究的議題。不過，問題的重點不是學術，而是人。也就是說，歷史修正主義是「一群人」，不是「一個派別」。這群人經常以學者的姿態出現，利用學術研究的假相，對歷史事件進行有別於主流「觀點」的詮釋。歷史修正主義者的「觀點」總是可以流行一陣子，尤其是經過媒體的操弄，經常會被誤解爲是一種「時代精神」。要破解這類「迷思」不難，只要學者能夠秉持學術研究求真的良知，媒體也能自覺對傳達「歷史正確」的責任，應該就可以遏制崇尚「爆料」、煽情和違反常識的歷史修正主義之蔓延。但是，如果問題牽涉到政治意識型態，這個迷思就很難破解，日本的教科書該用「侵略」或「進出」，台灣的教科書該用「抗戰」或「終戰」，恐怕都不是學術研究可以解答的，在這些文字遊戲的背後暗藏著太多的政治效應。歷史修正主義只是一種手段，民族主義也是手段，最終的目的是國家利益（也包括政黨利益）。然而，如果只是爲了統治的正當性而刻意炒作民族主義，扭曲歷史事件的意義，歷史事實最後會變成只是一種「觀點」，連帶使道德與司法最後也會變成只是一種「觀點」。政治人物在操弄歷史修正主義之時，應該審慎評估這種風險。

* * *

（收件：94年9月10日，接受：94年10月24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⑧ “Interview,”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 with Aiko Dodon of NHK TV, March 19, 2005, Tokyo, Japan, < <http://hongkong.usconsulate.gov/uscn/state/2005/031903.htm>>



Historical Revisionism and Neo-nationalism: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extbook Controversies in Japan

Chih-ping Lo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I-SHO University

Abstract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s a phenomenon of in post-modern world culture. It was originally a methodology or a viewpoint, which is adopted by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However, its purposive misinterpretation by nationalists has caused not only confusions between facts and falsehood, but also a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hips among Asian states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common misunderstanding, and as a result the misuse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m”. Both 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the “Comfort Women”, two unsolved historical issues within the Sino-Japanese diplomacy, are also included in this discuss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 is possible to develop a clear picture of what is so called historical “truth” if we go beyond the nationalist partiality.

Keywords: Historical revisionism; Textbook; Nanking Massacre; Comfort women



參考文獻

- 千田夏光 (1973), 《從軍慰安婦—その支配と差別の構図》, 東京: 雙葉社。
- 小林善紀 (2001), 《台灣論: 新傲骨精神宣言》, 台北: 前衛出版社。
- (2001), 《第二波台灣論》, 台北: 前衛出版社。
- 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 (1990), 《「NO」と言える日本》, 東京: 文藝春秋。
- 江宜樺 (1998), 《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 台北: 揚智文化出版社。
- 陳光興 (2001), 「日本右翼思想的台灣效應」,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論壇》, <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taishe/frm_twl_chenguangxing.htm>
- 猪口孝著, 賴郁君譯 (1994), 《日本: 經濟大國的政治運作》(日本—經濟大國の政治運営), 台北市: 月旦出版社。
- 楊思偉 (1999), 《日本教育》, 台北市: 商鼎文化。
- 羅志平 (2005), 「論 Holocaust 的研究與族群和解」, 《問題與研究》, 44: 4, 25-43。
- Nanta, Arnaud (2001), 「日本: 歷史修正主義者的攻勢」, 《人權論壇》, <<http://www.creaders.org>>
- Pyle, Kenneth B. (1996), 傅曾仁譯, 《日本的問題》(The Japanese Question), 台北市: 金禾出版社。
- Breuilly, John (1993),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David (2000), *Contemporary Nationalism: Civic, Ethno-cultural and Multi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Chang, Iris (1997),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Un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Penguin.
- Continetti, Mattew (2003), “Hobsbawm Speaks on Historical Revisionism,” *The Columbia Spectator*, <http://www.columbiaspectator.com/vnews/display.v?TARGET=printable&article_id=3e89597c70a03>
- Derbyshire, John (2004), “Understanding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Washington Times*, March 7, <<http://www.washtimes.com/books/20040306-102116-9387r.htm>>
- Enloe, Cynthia (1989), *Bananas, Beaches,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Pandora.
- Evans, Richard J. (2002), *Lying About Hitler: History, Holocaust, and the David Irving Trial*, New York: Basic Books.
- Faurisson, Robert (2000),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s the great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Dissecting the Holocaust*, Theses & Dissertation Press.
- Fiatt, Fred (2005), “China’s Selective Memory,”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8, p. A 17.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eertz, Clifford (1995),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ies, Peter Hays (2004),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California: The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Hayashi, Hirofumi (1998), "Japanese Comfort Women in Southeast Asia," *Japan Forum*, 10: 2, <<http://www32.ocn.ne.jp/~modernh/eng04.htm>>
- Hillenbrand, Barry (2005), "Good Morning, Vietnam," *Time*, 165: 17, May 2.
- Hobsbawm, Eric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an, Nish (2000), "Nationalism in Japan," in Michael Leifer, (ed.), *Asian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 "Interview,"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 with Aiko Doden of NHK TV, March 19, 2005, Tokyo, Japan, <<http://hongkong.usconsulate.gov/uscn/state/2005/031903.htm>>
- Kersten, Rikki (1996), "Defining Neo-nationalism in Postwar Japan," Conference Paper, British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Studies Conference,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 Kersten, Rikki (1999), "Neo-nationalism and the 'Liberal School of History'," *Japan Forum*, 11: 2, 191-203.
- Kosaku, Yoshino (1992),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Japan*, New York: Routledge.
- Kulaszka, Barbara, (ed.) (1992), *Did Six Million Really Die: Report of the Evidence in the Canadian 'False News' Trial of Ernst Zündel-1988*, Toronto: Samisdat Publishers.
- Ludden, Jennifer and Rob Gifford, "Chinese Protest Japanese Texts On World War II," <<http://www.npr.org/>>
- Lukacs, John (1994), "Revis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Heritage*, Vol. 45, Issue 5, 83-88, <<http://web36.epnet.com/>>
- Matthiessen, Connie (2005), "Chang, Interrupted," <http://www.sanfranciscomagazine.com/home/view_story/242/>
- Morris-Suzuki, Tessa (2001), "Truth, Postmodernism and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n Japa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 2, 297-305.
- Mutsuko, Murakami, "Pioneering Journalist Yayori Matsui Dies," <<http://www.fccj.or.jp/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category=2&start=0&articleid=102&start=150>>
- Nairn, Tom (1981),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of Neo-Nationalism*, London: NLB.
- Nash, Gary B. (1995), "The History Standards Controversy and Soci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29: 1, 39-49.

- Orecklin, Michele (2005), "Dan Brown: The Novel That Ate the World," *Time*, Special Issue, April 18.
- Piper, M. Collins (1994), *Best Witness: The Mel Mermelstein Affair and the Triumph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m*,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Historical Review.
- Rabe, John (2000), *The Good Man of Nanking: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tr. by John E. Woods, New York: Vintage.
- Rugg, Harold (1941), *That Men May Understand: An American in the Long Armistice*,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 Scott, Joan (1988),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arrett, Christopher, "Revisionism, History and Hollywood-historical Revisionism in Motion Pictures-column," <<http://www.looksmart.com/>>
- Singer, Peter (2004), *The Present of Good and Evil: The Ethics of George W. Bush*, New York: Dutton.
- Smith, Anthony (1998),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M. L. R. (1999), "The Trouble with Guns...and Academic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2: 4, 363-366.
- Snyder, Louis L. (1968), *The New Nationalis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paeth, Anthony (2005), "Textbook Tensions," *TIME*, 165: 16, April 25.
- Tamir, Yael (1993),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ice, Terrence N. (1994), "Historical Films," *Education Digest*, 60: 4, 47-52.
- Ueno, Chizuko (1999),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ation, Individual and Self," *History and Memory*, 11: 2, 129-152.
- White, Hayden (1996), "The Modernist Event," in Vivian Sobchack, (ed.), *The Persistence of History: Cinema, Television and the Modern Even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Wilford, Rick and Robert L. Miller, (eds.) (1998), *Wome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 Yardley, Jim (2005), "China Puts Brake on Anti-Japan Protest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iht.com/>>
- Yoshiko, Nozaki (2003), "Japanese Politics and the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y, 1982-200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37 (6&7).
- Yoshiko, Nozaki (2005), "I'm Here Alive: History, Testimony, and the Japanese Controversy over 'Comfort Women'," *World History Connected*, 1: 1, <<http://worldhistoryconnec>

ted.press.uiuc.edu/1.1/nozaki.html>

Yoshimi, Yoshiaki (2001),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Yual-Davis, Nira and Floya Anthias, (eds.) (1989), *Women-Nation-State*, London: Sage.

Yual-Davis, Nira (1997), *Gender and Nation*, London: Sage.

